

探索傳鐘

余玉琦/臺大藝術史研究所碩二
張毓庭/臺大藝術史研究所碩二
李定恩/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博一

這篇文章原出自2008年石守謙教授指導的藝術史研究實習課程「校園公共藝術報告」。在製作過程中，我們愈發感到對傳鐘的了解很少，因此持續進行研究，在這過程中，感謝石守謙老師、陳葆真老師、謝明良老師及黃蘭翔老師的指導與鼓勵，也感謝臺大校友雙月刊林秀美小姐、總務處文書組檔案股、人事室、校園規劃小組、總務處營繕組、圖書館特藏組、國防部李嘉恩中校、軍備局檔案室，以及陳振川老師、康有德老師、崔柏銓老師等人提供資訊與從旁協助。

前言

這是21世紀的第九個春日，杜鵑花經驗老道地一起開放，和它們差不多同時定居在此的，還有原本生在高地的龍柏，以及那座超過5公尺高，每天被敲響的鐘。^[1]相較於盛開花瓣的粉嫩新鮮，紅色鐵架上，西式吊鈴樣式的鐘生滿了暗沉的銅綠，它雖不同於中式的鐘鐸而有著西化的身姿，但鐘身布滿紋飾，上窄處陽刻有「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八字篆書，以及區隔出紋飾範圍的頂端圈線與鐘裙的波浪線條，大有穿著中國傳統禮樂重器之袍的氣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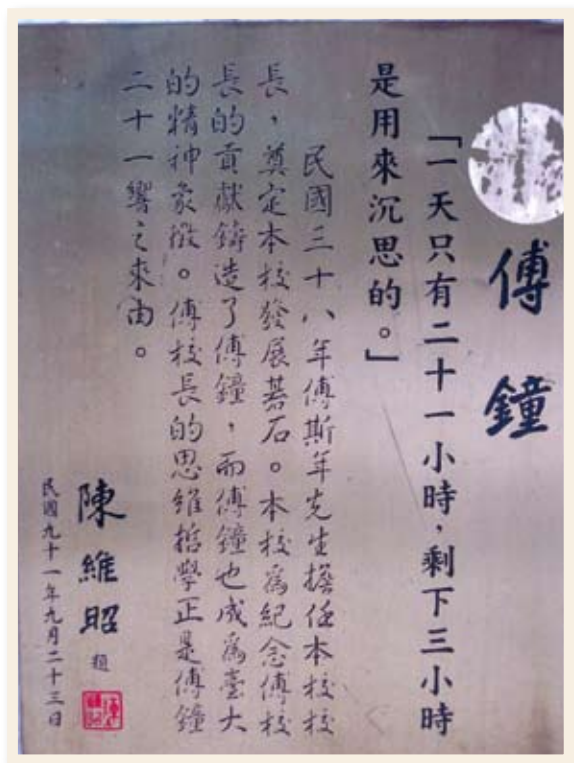


鐘體刻有臺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八字。（攝影／李定恩）

鐘架下的基座是突出於地面的圓型平台，平台中央地面設有方位指標，台緣設八短柱，覆洗石子，每兩柱之間置一梯，每梯四階，其中一短柱嵌有「傳鐘」解說牌，而鐘台石座外圍矮木遮掩處，可見電子敲鐘的引擎箱。當暮色來臨，地燈投射的照明光源穿越四株環植的龍柏向上攀索，這座鐘台像忽然被推上了獨角戲的舞台，光在它呈放射噴泉狀的四柱鐵架流動，最後停佇集中在懸吊的老鐘上。

我們一定都看過在鐘下沉思者、閱讀者的身影，又或是一對對情侶、朋友、親子，甚至，自由休憩、翻飛的鳥兒，或經過或陪伴，以各種不同的姿態，成為這座流動時光裡不動鐘亭的風景，而鐘聲也常常就這樣好似回報地響了。

走上傳鐘鐘亭，可見前校長陳維昭於2002年9月23日鑲嵌在短柱上的簡介牌，你便可輕易得知本鐘是為紀念故校長傅斯年所鑄。



傅斯年要面對的，除了學校因襲舊制、百廢待舉的問題外，當時的時勢動亂、人心惶惶也是另一方面的困厄夾擊，然而他在短短不到兩年間，如同之前代理北大校長的作風，免職了靠關係進入臺大的人士，建立考試入學制度，轉向以教學為要務的美式大學學制，也引薦北大學者進入臺大，加上傅校長在四六事件為維護校園民主和學術自由所採取的具體保護學生行動，讓學生們印象深刻，開始一一細述這位校長的軼事和不幸之悲，甚至，有些激動的學生至省議會聚集抗議，以為是郭國基質詢失當「氣死」傅校長（最後還是被勸回了）。隔日，臺灣省議會響應臺大建孟真堂，很快地擬請政府撥款補助，在同一天下午就獲通過。

12月30日，治喪委員會再度開會，決議將

紀念・鐘

1950年12月20日，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前往臺灣省省議會第五次會議，接受立委楊肇嘉、郭國基等質詢校務，離開質詢臺後，忽然因腦溢血陷入昏迷，於當日晚間11時辭世。

◆傅斯年逝世後各界反應

12月23日，傅斯年先生治喪委員會在臺大校總區會議室舉行，除了處理公祭事宜，也立刻議定規劃籌建「孟真堂」。^[2]這天全校停課一日，事出突然，依舊到校的學生不少，不久，便可見到一群群圍著討論的人們，哀悼的氣氛擴散開來。^[3]他們談論的這位校長，1949年1月20日搭著特別飛機從北京經上海抵臺。那時候的臺大，雖然已經脫離了日本統治下的「臺北帝國大學」階段，然而直到這位校長抵達前仍沿用舊制——經過校長室前的人們朝敞開的門口深深一鞠躬，或是女工友接電話時仍使用日本話。^[4]傅校長到任那一年，蔣中正宣布引退總統一職，代理的李宗仁則欲與共產黨謀和，接著12月，國民政府就退守到臺灣。



傅斯年校長猝逝，帶給臺大師生無盡的追思。圖為安葬前的行列。（翻攝自「41學年畢業紀念冊」）



臺大將熱帶植物園改稱傅園，並設衣冠塚。圖為眾人追思一景。（翻攝自「41學年畢業紀念冊」）

原擬建於校內的孟真堂改稱為「斯年堂」。^[5]隔年的2月，治喪委員會改組為「斯年堂籌建委員會」，計畫募款，那次出席會議並參與規劃的代表委員，包括了民意代表、政府機關、新聞界、國民黨部、山東同鄉、地方團體及臺大人士，不敷之數再請政府撥款補助。^[6]

除了「斯年堂」，還有諸多紀念建設也如火如荼地進行，例如，稍早於斯年堂籌建會議的1月22日，《臺大校刊》就出現了一則提議建造大鐘的新聞。^[7]

◆「紀念鐘」的條件

「頃閱報載，本校紀念傅校長有建紀念堂鑄半身銅像，及葬骨灰等舉，此皆極有價值，銓今建議另一紀念物不知可否，即大鐘一座（附一鐘亭，此鐘至少須5尺高）。傅校長一生努力於攻擊頑劣及喚起國家之正義，今以此鐘繼續發揚之，呼喚後世學子繼續為自由為正義努力上進。每日上下課鳴此鐘，則全校之時間可以統一，聽不清聲音的小鐘，及分散各處不能一致的鈴，都可以取消了。此鐘之意義深遠，先生之意如何，如可，請予發動之。」

就讀物理系的崔柏銓，寫了這樣一封信給當時擔任斯年堂籌建委員會之一的毛子水教授，他的提案由毛子水附議轉介登在校刊上，隨即就被採用，納入了紀念建設的工程中。^[8]關於這座紀念鐘，校方的做法為轉請傅斯年內兄俞大維曾任



1951年12月20日上午10時整，傳鐘初鳴55響，向為臺大鞠躬盡瘁的55歲傅校長致敬。（翻攝自「41學年畢業紀念冊」）

職過的兵工署捐鑄鐘體與金屬吊架。

1951年5月28日，臺大發文給聯合勤務總司令部兵工署，並且附上鐘的口徑大小樣紙，以及由工務組（今總務處營繕組）尹永生所繪之設計圖。^[9]這張設計圖，如今雖已隨著兵工署移併軍備局後，可能因超過保存年限被銷毀了，但是校方的公文上這麼記錄著：「…紀念鐘草圖，業由本校擬就，鐘上刻字亦經題就，茲連同口徑大小之樣紙一張，一併隨電附送…」

鐘的正式全名為「傅故校長紀念鐘」，官方公文提及，一律簡稱「紀念鐘」，在這時候，還沒人稱它叫做「傳鐘」。

「紀念鐘」在同年9月27日鑄成，由受到原是素昧平生之傅斯年特別賞識的總務長黃仲圖負責洽運回校；12月6日，臺大發文國防部防空司令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臺北市警察局，報備將於傅斯年逝世周年安葬典禮中，於臺大行政大樓前鳴放爆竹、敲響紀念鐘，獲同意照辦。

1951年12月20日上午10時整，便是這「傅故校長紀念鐘」的初鳴，以55響，向為臺大鞠躬盡瘁的55歲傅斯年致敬。紀念鐘立在四棟最高不超過3樓的校舍中央，居於中心樞紐地位，鐘聲聽起來更加悠遠。

傅鐘精神的形塑

◆從「紀念鐘」到「傳鐘」

在安葬典禮之後，紀念鐘便成為了每日必要敲響的作息鐘。

「紀念鐘」與「紀念堂」是唯二以大圖象形式並列在臺大秘書室主編、安葬典禮當天出刊的《臺大校刊・紀念傅故校長專號》上，也是「紀念鐘」的第一次公開圖象；然而，從1951年後至1970年代間的《臺大校刊》，就未再出現紀念鐘的相關新聞或是圖像了。

這段日子以來，學生對這座鐘亭的稱呼很多元，並不特定，當要提起這座鐘，有人說鐘亭，

有人說鐘樓，有人說傅校長紀念鐘，也有人說自由之鐘；而直到民國50年起，才開始有些人稱它為「傳鐘」。

經過了十多年的日曬雨淋，1964年，銅鐘被發現有裂痕，鐘聲也不再嘹亮——在紀念鐘正式啟用之前，臺大先是延續日本學制以放氣笛的方式來上下課，接著才是各區的鐘鈴報時。而當初負責繪製紀念鐘設計圖、這年已任職工務組長的尹永生，在5月27日發函給當年幫忙鑄鐘的聯勤第44兵工廠，請求於暑假期間來拆鐘亭，重新鑄造。

這次的重鑄，負責人是掌管第44與60兵工廠的陸軍少將郭履荃，從7月拆卸到12月再次落成，期間臺大曾發函催促，他都一一速件回函說明。新鐘讓校方相當滿意，特意在答謝郭少將的謝函中提及紀念鐘嘹亮的聲響。

在往返公文裡，校方仍然以「紀念鐘」稱之，但在學生之間，「傳鐘」已不知不覺間取代了「紀念鐘」的稱法。

由學生主編、校方指導的《臺大青年》第一期正好也在紀念鐘重鑄同年出版，其中便有同學發表〈傳鐘底嘆息〉一文來感懷反省自己的四年大學生活。1972年第66期「傳鐘下的寄語」專題，主編邀請了當時應屆畢業，且曾活躍於社團的學生領袖書寫畢業感言；1975年元旦第72期中，也可見到以「傳鐘下的憧憬」為專欄，開放學生書寫校園憧憬小語。這時，不管是《臺大青年》還是畢業紀念冊，都可見傳鐘在部分學生意識裡，已超越其他校景，與臺大生活畫上等號了。

這個時代的學子，可能有些人已不像上一個或上上個10年，還能透過校方積極的紀念活動感受到傅斯年逝世、使臺大痛失學術與教育巨舵的悲痛意義，他們知道傳鐘與傅斯年相關，因為他們都聽著傳鐘的鐘聲上下課；傳鐘的存在，本來就是生活中很理所當然的一部分。

1980年代，校方公文中也開始使用「傳鐘」一詞，例如1983年辦理的學生社團活動獎勵即名

為「傳鐘獎」、1984年由訓導處所發的懲戒半夜亂敲鐘的學生公告函上則明文強調「本校傳鐘…具其莊嚴性…不可亂敲」。整體而論，自1979年代起，幾乎不管校方與學生，都不再見到「紀念鐘」的稱法。^[10]

◆兼容與張力

1951年4月8日，39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上，洪樞、洪耀勳、蘇薌雨三位教授共同提案將『敦品勵學愛國愛人』訂為校訓，但未通過；一個月後，這段文句成為紀念鐘上的擬定題字，且在兩次鑄造時都未被更動，這是繼提議建造紀念鐘時所列的諸多條件之後，臺大師生賦與此鐘意義的開端。

1960年代，除了從紀念鐘到傳鐘的稱呼的轉變，學生對傳鐘的意義定位，也呈現了多元現象，敦品勵學與愛國愛人是在鐘面上最直接的提示，以鐘聲代表學校生活是最常被使用的，其次是在畢業紀念冊出現，以鐘聲代表自由之聲的意涵。

1970年代，無論是與校方關係較密切的《臺大青年》或是學生地下社團刊物《大學新聞》，都展開了一連串關於民族與民主的論述，尤其《臺大青年》中更可見許多「臺大精神」、「臺大校風」的議題，並且時常運用傳鐘為底圖版



1960至1970年間，傳鐘因著校園運動活躍而逐漸成為臺大精神的象徵。

型，或是大量使用傳鐘剪影。1972年起，林聖芬主編了兩期《臺大青年》，有意識地以文字梳理臺大校史和校風的分期，並且使用傳鐘與傅斯年做為他理想的臺大傳統起點。

這種充滿了自覺意識的討論風氣，出自於當時不利的國家情勢，臺大學生發起的保衛釣魚台運動，被後人視為是極具代表性的自覺運動開端，而當1972年美國終究將釣魚台列島與琉球移交給日本，幾位臺大學生便號召同學，選擇坐在傳鐘下絕食抗議。這個舉動，使臺大傳鐘成為學生運動抗議根據地的原點，也是許多社會運動人士的起點。

此後，傳鐘下陸續有懷抱著不同議題，以及不同詮釋角度的人前來靜坐，他們關心的議題有校園、有社會，有民族主權、民主自由或人權等等；更有雖起自相同事件與目標，但各自又有不同理念與理由而聚集在一起的人。這時候待在傳鐘下的學子，不再是為緬懷故校長行誼而來，也不再沉浸於死亡的傷感中，他們從傳鐘擷取屬於自己的理想，如同傅斯年生前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要維護民族氣節與自由學風的雙重特性，傳鐘成為了一種能各取所需的精神詮釋載體，這是傳鐘在1970、80年代被政府監控的臺大校園裡，具有張力又極其重要的意義塑造階段。



1982年臺大舉辦校徽徵選活動，當時獲得前三名的作品及其作者（左上）。最後制定之校徽是由三位得獎作者與校方共同修訂完成（右上）。（攝影／李定恩）

◆校徽競圖

如果回溯自1945年改制以來的30年間，臺大其實一直是一所沒有校徽，校歌也屢屢更替的學校。1981至1982年間，臺大訓導處主辦了一場校徽徵圖競選活動，消息公告後，投稿應徵的稿件共有75件，經過初審、評選及複選三階段，最後選出了前三名作品。這三件決選作品中，有兩件與傳鐘的形象相關；而未出現傳鐘母題的決選作品，雖然以鼎為主要圖像，但其上所刻的字也與傳鐘的刻字內容一樣。設計者在設計理念稿中說，這個鼎是來自傅斯年的「貢獻這所大學以宇宙的精神」一語。這三件作品的作者，後來與農業陳列館游光義主任共同修改繪成了一個由「梅花、校訓、傳鐘、椰樹」元素所組成的校徽。經校方於1982年9月14日決議通過，其後各在1983年及1997年取得標章專用權。

由於校徽運用在許多辨識「臺大」身分的場合或物件上，傳鐘就此名正言順的成為臺大的象徵物。

◆從校園走向公眾

2002年夏天，擔任總務長的陳振川正為椰林大道的全面整修工程傷腦筋，因為7月22日正式施作後，直到工程接近尾聲才發現，整修工程竟遺忘了傳鐘。椰林大道工程雖包含整修傳鐘廣場，卻獨漏鐘亭，自1964年傳鐘重鑄以來，經過近40年光陰，傳鐘基座已下陷、老舊失修，所以再度整修必然要花費更大力氣。^[1]

「就快開學，作業時間實在不足，另外又怕以最低標方式再花錢去做出一個品質不良的工程！」因此，出身土木系的陳振川先生便號召土木系校友共同以「不具名」方式捐款整修，交由校園規劃小組設計，由「福達營造」施工。此次整修內容包括嵌入一圓形大理石基座，並刻上傳鐘簡史，以及週邊斬石處理等，所需經費約20萬元。在發動捐款時，兩名土木系校友自告奮勇要全額捐獻，然而陳振川設定以分享光榮為主旨，



2002年於整修椰林大道後，由當時擔任總務長的陳振川教授發起校友捐款修繕傅鐘基座。（攝影／李定恩）

所以規定一人以1萬5千元為上限。結果捐款情況相當踴躍，一週內便順利達成目標，並且趕上9月23日上午8時30分椰林大道整修工程啟用儀式。

今日所見的鐘亭樣貌即為2002年修建成果，而鐘體與鐘架仍保持1964年原樣；唯一接近鐘體的修改，是將暴露在鐘架上的大引擎箱改置於大理石座下，隱蔽於矮樹間。傅鐘原由人工敲鐘，此傳統一直保留到2000年元月，之後即進行電子敲鐘裝置工程，以後便改用電子裝置。

陳振川教授回想1970年代左右在臺大求學期間，反而不像現在那麼清楚而強烈的意識到傅鐘的象徵性，他說，直到擔任總務長，與校園規劃小組深入互動，加上2005年開始了博物館群與校史館推動的校史整合工作，才有機會更進一步了解，也實際著手建立諸多文化推廣的制度與設施。

現在的傅鐘，與過去造型有兩處明顯不同，一是增加鑲嵌了傅鐘簡史說明牌，二是在基座平台上設置了方位標誌。傅鐘修繕工程的承辦人、營繕組羅健榮工程師表示，設置此一標誌的概念來自臺北市的公共場所道路方位指標。換句話說，2002年再度整修，也可說是近年臺大校園文化如何被放在公共脈絡的代表起點，這是傅鐘在這個時代所產生的另一種新指標意義。

結語：傅鐘、傅鐘、敲幾響？

一位銘傳國小的小朋友這樣說過：「老師說，傅校長要傅鐘敲二十一響！」^[12]

走上傅鐘鐘亭，可以看見副標「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內文這麼寫著：「民國三十八年傅斯年先生擔任本校校長，奠定本校發展基石。本校為紀念傅校長的貢獻鑄造了傅鐘，而傅鐘也成為臺大的精神象徵。傅校長的思維哲學正是傅鐘二十一響之來由。」

「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這段話的來源出處並未見於傅斯年校長本人的文集或是相關演講、語錄中。不過，翻閱《臺大青年》91期（1985年），竟然出現了「傅鐘二十二響」的文案，而成功大學校史網站也引用了標為傅斯年語的：「一個人一天除了工作、吃飯、睡覺外，還要留兩個小時來思考。」^[13]

傅鐘第一次敲響時，是為了55歲的傅斯年敲55響，接下來的1、20年間，很少人特別記得自己所聽的上下課鐘聲究竟是敲了幾響，也沒有人特別在意其意義。如今，要規定傅鐘現在「應該得敲幾響」也不重要，但其過去眾說紛紜的響數歷來是如何形成，是由哪些人塑造的身世，必然又是另一段值得探討、反映了臺大校史新面相可能的故事。

1951年，國防部兵工署除了替臺灣大學鑄造紀念鐘外，隔年也受成功大學的前身省立工學院陳請，依樣再鑄造一座鐘塔暨大鐘，以利該校上下課、集會傳達之用。^[14]不過這座傅鐘的雙胞胎後來因喪失實用性而屢遭搬遷，近年才拆除老鏽鐵架，重新砌造石台，並移到比較開放的廣場，作為校史紀念物。相較之下，傅鐘從紀念、生活作息的角色，走向大學生精神象徵與公眾文化景觀的身分，鏽則鏽矣，卻也仍然鏗鏘然數十年如一日。

